董必武同志培养我入党

■钱 钧

星火燎原 撷英 14

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党的理论得到了广泛传播，党的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1925年10月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了在极短时间内将党“从小团体过渡到集中的群众政党”的要求，强调要“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智识阶级中最革命的分子”入党。本文记述了董必武同志循循善诱地引导作者懂得革命的意义，了解团结的重要性，学习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提高了对党的认识，加深了对党的感情，并最终介绍作者加入中国共产党，把一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道路。文章充满真情实感，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如磐信念，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忠诚于党、矢志革命的崇高理想。

一九二一年，董必武同志在上海参加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便回到了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积极开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从一九二三年开始，他还经常来到农村，亲自指导农民运动。我第一次见到董老是在一九二四年冬天，当时，我在汉口一家翻砂厂里当倒锅工人。

那是一个漆黑而又寒冷的夜晚，我由厂里一位老师傅带领，在大悟县一间瓦屋里见到了董老。当时，董必武同志四十岁刚出头，他脚穿浅口布鞋，身穿灰色长衫，套了一件黑布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脖子上围着一条颜色很深的围巾，最突出的是他嘴上那两撇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看上去活像个教书先生。他面色憔悴，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有神，给人的感觉是可敬可亲，在他面前，我一点也不拘束。进屋时，我先喊了一声董先生，然后又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他让我坐下以后，便开门见山地说：“你叫钱永兵(我当时的名字)？”他接着说，“你才这么点年纪，就会那么多手艺，作画、烧炭、倒锅、当漆匠，还会打拳，为什么混不上一顿饱饭吃啊？”我真没想到他对我这样熟悉，更没想到初次见面，他就提到我的吃饭问题，我一时不知从哪儿谈起。董先生不等我答话，又说：“你家三代人都是地主岳六平家的长工，可是就在大年三十那天，他把你们全家人都赶了出来，过不上年，吃不上饭，这是为什么？”

“没有地种。”

“你不能把他家的土地拿过来吗？”

“他是光山县最大的地主，势力大，拿不动。”

“岳六平罪大恶极，伤人害命，你还不把他镇压了，镇压了他，不就拿过来了吗？”

“灭了他还行，灭了以后怎么办？”

“革命呗，怎么办。”

说实在的，当时，对“革命”两个字，我还不太懂，更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革命”就是要把地主阶级打倒，穷人要翻身，所以，我对董先生提出的问题，回答得很坚决：“中！”

接着，董必武同志又用火柴棒在桌面上摆出了一个“人”字，并意味深长地说：“你看到天上飞的大雁吗？它们飞起来总是一个‘人’字形的，在‘人’字的头上，有一只领头的大雁，指挥着整个雁群的行动，我们干革命，同大雁的飞行一样，也得有个领头的来指挥，这个‘头’就是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在哪儿？”我早就听说有共产党，而且我也知道共产党是专门为穷人办事的，就是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共产党，所以，他的话正说到我心里。

“你找党找不着，党找你可以找到。”他看了我一眼又神秘地说，“我只对你讲，我是党员，毛委员是党员，其他的你别问，你问，我也不能告诉你。”

董先生的话使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厂里有些人的行动那样保密，原来共产党是秘密的。我本来想向他提出来“党什么时候来找我”，但我不知道党要找的是不是我这样的人，因此，也没有说别的话，向董先生鞠了个躬就出来了。他走出门把我送了好远才回去。

在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是点亮了一盏灯，浑身是劲，原来董先生就是共产党员，他懂的事情那么多，我有了这样的老师，今后革命就不用愁了。

一天晚上，厂里那位老师傅通知我第二天去听一个人讲话，这人是谁他没讲，我看厂里去的只有几个人，估计保密，也就没问。到了会场上，讲话的人是一个戴眼镜的，留着两撇胡子，像个知识分子。经别人介绍，我才知道他就是李大钊同志，他的讲话，可能是道理太深，也许是口音的关系，大部分我都听不懂，只有一段话，我至今还记得它的意思：雇农、贫农和中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但他们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地主、富农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但他们却占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土地，而且多半是好地近地。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没有解决土地问题，什么“天朝田亩制”“土地国有”“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等等，都没得到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这一任务，共产党是真正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党，是真正为穷人谋利益的党。

李大钊同志的讲话，提高了我对党的认识，加深了我对党的感情。事后我才知道，通知我去听李大钊同志讲话是董先生安排的。

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威望越来越高。当时，“拜列宁”，在光山县殷区很大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已成为最高的荣誉。因为入党，要在列宁像前宣誓，所以，大家都知道，拜了列宁就是党员了，那时，我们管这叫“拜列宁”。我当时天天想着“拜列宁”，就是没人来找我。

一九二六年，春节刚过，董必武同志又来到了我的家乡，因我同他见面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他什么事情都叫我去做，送信，找人，下通知，有时连他吃的点心也是我去买。不管公事私事，我都尽心尽力地为他办好。因为他日夜不停地忙，太辛苦了。有一天晚饭后，他要转移到另一个村去，我护送他，当我们从大路拐进小路时，他拉我在田埂上坐了下来，说休息一会儿再走。董先生坐下以后，顺手捡起一根树枝，用另一只手把地上的土抹平，在上面画了一个圈，圈的当中画了一些人，然后，他拍拍手上的土，用那根树枝指着一圈人问我：“你说，这一圈人打中间这一个人，打得过吗？”我说：“打得过。”他又指着圈当中那一个人问我：“这一个人打周围这一圈人，打得过吗？”我说：“打不过。”接着，他又分别拿一根树枝和一把树枝要我把它折断。一把树枝当然是折不断的。他笑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要团结，团结起来力量大。”他听了，很高兴，说：“对，革命就要团结。”我笑了，我感到董先生真会开导人，说得我心里亮堂堂的……两个人说着说着，不觉天已黑下来，我担心他的安全，催他快点赶路，他点点头，说：“好，走吧。”

过了几天，我们厂里工人纠察队出了事，情况很紧急，我必须马上找董必武同志请示，还是那位老师傅告诉了我董先生的住址。见了董先生以后，不等他开口，我便一口气说完了发生的事情和我自己的想法：“陈独秀下令，要工人纠察队把所有的武器全都交出去，我是纠察队的小组长，发了一支匣子枪，现在硬逼着我把这支枪交出去，枪是穷人的命根子，怎么能交呢？要命有一条，交枪我不干。”董先生听完了我的想法以后，指示说：“你的想法很好，不交枪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再在厂里干下去了，必须在五天之内，离开那个地方。”我答应了。他担心地问我：“你用什么办法把枪拿出来？”这事我早有准备，我把我带枪的办法报告了董先生，他表示同意，并一再叮嘱我要提高警惕。

这天夜里，厂里的人走的走了，睡的睡了，我拿出事先买来的木柄剃头刀和十多斤糙纸。十多斤糙纸有一尺半多厚，我先把它分成几叠，按照匣子枪的轮廓，用剃头刀在纸上刻出了像枪那样厚的一个深槽，把枪放进去，再把纸摞好四周弄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捆好，一点也看不出这纸是动过的。二十发子弹也是用这个办法藏到纸里去的。为了掩人耳目，我借了一件长衫、一顶礼帽，穿戴起来。过门岗的时候，我提着糙纸，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第二天，我把带枪离厂的事报告了董老，他很满意，就在这一天，他规定了一个日期，叫我按时到湖北省的河口村去找他。

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一天晚上，我在河口村很隐蔽的一间草屋里找到了董必武同志，他很郑重地对我说：“共产党的事业，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可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完不成的事业，你有信心吗？”我坚定地点了下头，我认为这比我说话更能表达我的决心。他又说：“当党员，干共产党的事，很艰苦，要流血，还可能牺牲生命，你怕不怕？”我用力地摇了摇头。董先生见我态度很坚决，便站起来，在小屋里踱着步。这时，不知为什么，我心里有些紧张，过了一会儿，他把夹在书里的一张半身列宁像拿出来贴在墙上，把党旗挂在列宁像的上面，党旗上有镰刀、斧头和犁，看到这庄重的场面，我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知道这不是一般的时刻，也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是关系到我今后做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大事情。

董必武同志首先给我讲解了党章的内容，并反复向我说明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然后，他站在列宁像和党旗的左边，要我成“立正”姿势面向列宁像和党旗站好。董必武同志举起了右手，我也举起了右手，这时，我似乎感到在这小屋里站着的不止是我和他两个人，还有很多很多人也举起了右手，站在董必武同志的周围，和我一起跟着董必武同志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董必武同志放下右手，来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钱永兵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今后不管干什么事，遇到什么情况，都要以一个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一瞬间，无数的往事，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流着眼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是董必武同志把我这个放牛娃领上了革命的路，是董老领我宣誓入了党，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钱 钧 出生于1905年，河南光山人。文中身份为武汉翻砂厂工人纠察队小组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0年逝世。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汨罗江

■马淑琴

童年的端午，母亲把五色丝线
缠成一串迷你小粽
挂在我紫色小衫的衣襟
如同艾蒿提早开出细碎的小花儿
悬于五月的门楣
渴盼乡村弥漫升腾的紫气
一个叫丑儿的姐姐挎着卖粽子的竹篮
馋嘴的孩子们满街追着她甜甜的声音

从一叶小舟颠簸于沧浪之水
到满江龙舟竞相飞溅激越的桨声
艾香串起从楚辞里流出的岁月
每一步跋涉都是不屈的坚韧
流放之路结满深思的果实
天地之间感受你的叹息和疼痛
盛大的独唱占领一条诗河的源头
香草馥郁成千古圣洁的诗人

我常把家乡的永定河当作你的汨罗江
滚滚碧波是你宽大疏朗的衣袖
从深沉的水底打捞不朽的灵魂
不绝的涛声是如诉如泣的诗章
浪花提炼出离骚和九歌的音韵
河边艾叶是我与众芳的香草
繁衍成熠熠闪光的品质与精神
让五月键盘下载你的音准与旋律
巍巍华夏举起诗的魂魄与图腾

重上云蒙山

■冷克明

在立夏的前夕我重上云蒙山
去看那山顶正在盛开的杜鹃花
路上铺着方方正正的花岗岩
仿佛要把攀登的坷坎压平
汗滴在石阶上能引起山鸣谷应
不像当年落进土里无影无踪
路两旁的松柏、柞树和白桦林
在齐心协力地把山的海拔提升
它们争先恐后地往上攀爬
志在把鲜红的旗帜插上山顶

我早已没有了折花的冲动
盛开的花朵让我偶尔想起
满腔热血的年龄
当年爬山时留下的那些脚印
无论深浅都早已被山风抹平
就像我从人世间一路走来
苦乐悲喜都已被时间的灰尘掩埋
山路崎岖我几乎如履平地
高峰深谷不过是生活中一道小小的坎
到达山顶我会静静地坐下来
看白云在山谷里缓缓上升

沉默的高原

■孟 蒙

太高了，高到紫外线的拥抱
可以不避讳云朵
高到更多的氧气，已经无法攀升
高到脚下风云涌，手可摘星辰
太远了，远到无法抖落一路征尘
回望和远眺都是相同的风景
远到手机信号无法抵达
远到可以直接能听见
母亲、孩子和北京的心跳

在春天之上
在高出海平面五千米的地方
一切都是赤裸的
山，残雪和高寒
枪，战友和帐篷
不是生命禁区么
嘴唇皴裂，那是对山风的尊重
但不影响微笑或怒吼
指甲凹陷，那是对高原的尊重
但不影响握手或扣动扳机

不语，恰恰是因为想说的太多
在使命和担当面前，在国土的概念里
太多的表白都不如
你用行动践行的那两个字
我在

帕米尔哨所

■蔡 淼

风雪中熟悉的军姿
坚挺的身影伫立在国界
寸土寸心都是祖国的血肉
为祖国守大门
所有的孤寂都将化为英雄的荣光
岁月雕刻风骨
军号吹亮所有的海拔

在帕米尔哨所
五湖四海的方言汇成一首可爱的歌
行走在边界脊背
用双脚丈量每一个角落
那深陷雪坑的印章
是无声的誓言，是白色的语言
在眺望远方

又到了老兵离开的日子了
一只军犬
用浑浊的泪水映衬出
离别时的祝福
今后，它将像石头一样生长

荷风送香(中国画) 何晓云作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君从故乡来

■刘兆林

1

近些年，梦里不知身是客，常把他乡当故乡。

去年深冬，我在海南当“候鸟”，白日梦里正与故乡风雪说话，忽被手机铃声唤醒。大哥啊，我是贵双，刚从沈阳过来，一会儿去看看你！

叫我大哥的贵双，姓万，不是我弟弟。用老家那边的话说来看看我，便是啥功利目的没有，纯粹感情因素驱使。若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却说来找你，家人会泼冷水说，非亲非故的凭啥找你？而此时，妻子却催我，“赶紧去高铁站迎迎啊！”只这半句话已说透我和贵双的关系，非亲，但是有故，厚情源自老家。

东北人说老家，是指出生并青少年成长时期与你息息相关且葬有亲人尸骨的那方水土。我不到20岁就参军离家，去了很远的海防前线，后又调防中蒙边界一线，青壮年时光都在军营度过，40岁出头从军区机关转业后仍住在军营家属大院。而我的故乡在最东北边的黑龙江，离开那儿已50年。

小我十几岁的贵双，我俩是不惑之年后才认识，纯属断了骨头还能连着筋的故乡牵扯的。一条扁担似的少陵河，担着几近相挨的两座山，驿马山和少陵山。两山四周，那抓把土能攥出墨水似的黑土地，便是我和贵双的故乡，即中国地图上用放大镜才能找见的西集镇。若鼓起勇气，把故乡往大点说，便是发给我高中毕业证的巴彦县。我敢颠倒了大小顺序来说故乡，也说得过去。史书有载，先有西集镇，后有巴彦县。西集，就是汉语本意，西边的集市。哪儿的西边呢？满语“烟筒”之意的呼兰西边。呼兰，清朝时候就是县城了，即烟火气旺盛的地方。而巴彦，虽意为富裕的地方，但不如呼兰人口多而旺，所以那时便也归属呼兰管辖，民国以后才分设出巴彦县的。现今，呼兰和巴彦这相挨的两县，都划在省会哈尔滨的地图上了。贵双家在西集镇东南角的驿马山下，离县城巴彦近点。我家在西集镇西北的少陵山下，距呼兰近些。巴彦是抗日英雄、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领导者之一张甲洲烈士的故乡。呼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鲁迅先生赞许的女作家萧红的故乡。

2

十多年前有一天，还不相识的贵双通过另一位乡友找到我，还聚来几位在沈阳工作的巴彦同乡吃了顿饭，其中还有两位军转老乡。乡情裹着，一下熟了多年似的。不久，贵双带退休的县政协主席来看我。两个人，年纪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都朴实厚道，乐于为家乡发展做事儿，希望我能给点支持。我被热乎乎的乡情烘着，脑海中不断闪回着：永远安息了的3岁小弟，永远安息了的21岁大妹，永远安息了的未到30岁的二弟，永远安息了的都没到50岁的父母，我因而过早停止了回故乡的脚步。是贵双帮我激活乡情，陪我在生命之叶未落前，将灵魂之根又扎回故土。

贵双是被国有农场招工而落脚沈阳的。那时的国有农场多少带点军事化管理，踏实笃诚的贵双靠汗水洗白许多套工装后，成为分场场长。随改革开放脚步，贵双为故乡招商引资出了不少力。愧我是一介武夫，无能为家乡尽点微薄之力。乡友的聚会让我联想起读高中时见过的诗人县委书记、诗人村支部书记、诗人外语老师、作家文化馆馆员……是他们立于我心头的口碑，才影响我从戎后仍没投笔。我唯有动笔写写故乡，费费心血，带动培养一批也能用笔为家乡出力的人。后来，我构思了一个方案：设立“巴彦文学之星”奖，通过设奖、评奖，发现和培养一批有潜力的骨干，促进获奖者水平不断提高，终生为故乡的繁荣兴旺立传。但想法易生，做来难能。评奖、颁奖，办刊等一系列活动都需经费。若没钱还鼓捣这些事，那不是帮忙，等于添乱。贵双知道我的心思后说，大哥，你下决心张罗吧，钱我张罗。我懂，所谓钱他张罗，实质就是从他自身“抽血”。

此事共张罗了三届。每届征集作品，审评、颁奖、交流创作经验，都等于办一次学习班。有的获奖者甚至千里迢迢从国外赶回来领奖。首次颁奖那回，定好的日子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我们从沈阳出发那天，因特大暴风雪导致列车晚点，后半夜天快亮才到达县城。童年记忆中的一条河担着的两座山，都被过度兴奋的大雪掩埋了，县城高大的四座城门也被埋住半截，满城高挂的元宵节大灯笼却个个为我们涨红脸，那是故乡为欢迎我们而求来预兆丰年的瑞雪。有的偏远山区获奖者，因雪封山堵路无法通车，几乎是摸爬滚打着赶到县城的。我们从远方赶回的一伙乡友彻夜未眠，全都准时参加了出奇隆重的“首届巴彦文学之星奖”颁奖大会。铺天盖地的故乡雪和来自全县各乡镇村屯学校的男女老少获奖者，尤其获奖者里和我一同入伍又退伍回乡的战友那贴胸捶背的拥抱，让我永远也无法冷淡故乡了。返程路过我的老家西集时，雪比县城还厚，同来的部队战友和文友，尤其是贵双，都蹚着没了膝盖的雪，爬到少陵山上我父母的坟前，陪我焚烧纸钱。漫山洁白里留下那堆纸灰，成了我心头无法磨损、无法融化的雪雕。驶离故乡的列车两旁，茫茫无际，无处不是热的雪，暖我心。贵双说，“大哥啊，你病挺重的，还影响自己写作，值吗？”我说，“贵双，你病轻吗？你又不爱好写作，里里外外搭这么多钱，值吗？”贵双说，“我怕家人说犯贱！”我说，“有爱才会犯贱，哪个儿女不对父母犯贱？对故乡，咱不就是儿女吗？”

那次回老家后，我找出自己30年前所写《父亲祭》和自传体长篇小说《绿色青春期》，重读得感慨万千，后又分别写了《巴彦雪》《流浪汉还乡》《怀念一颗种子》等，算是还了故乡一点感情债。是贵双感染我还的。

3

两个同在沈阳安家多年的乡友，能在天涯海角的万宁见面，开心劲儿无以言表。

我的“鸟巢”，是开窗可以见山那种。见的却不是一般的山，是海南的大海和万宁的小海相连那段海河边一座特别坚实而内秀的山。那山，叫东山岭，朴素文静的怀抱里隐藏着许多浑然天成的巨石，是能注解“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那种耐人寻味的自信之山。山小石大，不自张扬却多有名人妙笔题刻巨字于其上。古人题刻的“海南第一山”，至今耀眼夺目于东山岭。

东山岭上的旭日还红着，我和贵双吃着头天冻下的酸菜馅水饺，又喝了一碗黑龙江小米和辽宁大米煮的二米稀粥，胃和心都十分舒畅。

东山岭的确不是高山巨岭。是的话，它眼前的小海也该叫南海了。我在意的是古时地方官员所题除“一”字外，字字一人多高的“海南第一山”那几个大字。万宁的一个芝麻州官，就敢大笔一挥，把自己所辖之山命名为海南第一的山，先不说字写咋样，最起码说明他有为官一任想把自己辖地治理得全海南最好的雄心。

人没雄心，事业必定干得小气。我陪贵双看东山岭，就是让他感受一下一个芝麻州官的雄心。

我说，贵双你姓万，万宁该是你的福地，福贵成双，你该在万宁置个“鸟巢”。说完才知道，贵双已在海南东方市安有“鸟巢”了。这回他刚在东方签妥一个股投项目，算是“候鸟”为海南面向世界建设自由贸易港作一份绵薄贡献呢。

从东方到万宁，环岛高铁半小时一班，一小时就到，相见不难，别也容易。那晚，我俩在“小小鸟巢”喝故乡那种简易情浓的饺子酒，借此回味当年各自在老家河里啊，山上啊，弄到活鱼鲜虾蘑菇木耳什么的，用柴火烧烤熟了再拿回家解馋的情形。一时，故乡又返老还童了。

长征 第4884期

文学作品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4时05分 印完5时25分